

清风明月襟怀阔 纵横文章报国心

——忆刘光第先生

□ 王广谦

今年是刘光第先生诞辰100周年。他是我
国著名经济学家，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也是
我学术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之一。在我
的心中，刘先生是一位循循善诱、品格高尚的
好老师，一位潜心学问、慎思明辨的学者，一
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

抗战烽火中立志学术救国，
研习探求民富国强之道

刘光第先生出生于职员家庭，自幼喜好读
书与思考，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和文化学养。日
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先是不抵抗，后
是节节败退。他深切感受到偌大的中国被日本
所欺，皆因中国虽大但积贫积弱所致，救国的
根本之路在于尽快使中国富强起来。面对日军
不断向内地侵入、祖国山河支离破碎的景象，
1939年，他从武汉辗转来到重庆，考入重庆大
学商学院学习富民强国之道。当时马寅初先生
担任商学院院长，给学生讲授“货币银行学”
和“中国金融论”两门课程。记得刘先生曾跟
我说起，马寅初先生的第一堂课就说中国的问
题在于贫、弱、愚、私，根本的出路在于使中
国富强起来，经济学就是探求富强之道的，希
望同学们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能够怀着这样
的爱国热忱来学习经济学。马寅初先生的一席
话使他激动不已。

刘光第先生求学期间的学习环境是非常恶
劣的，由于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他们不
能正常上课，每天都要跑几次防空洞。虽然如
此，马寅初先生对学生要求还是非常严格，鼓
励他们不管环境怎样艰苦，都要努力抓紧时间
学习。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在进防空洞时总是
带着书，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书籍。

1943年秋，立志继续深造、怀揣着盖有刘
大钧院长印章的本科毕业证书，刘光第先生来
到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报
到。这个学术机构由耶鲁大学博士毕业生何廉
先生创办于1927年秋，其主旨是“为我国社会
经济问题作实际解决之准备，兼谋我国社会科
学之发展”，坚持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与
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两个
原则，培养经世济民之才，探究中国社会经济
问题，首创中国物价指数，在学术上取得了累
累硕果，声名远播。刘光第先生是第7届学
生，同届同学还有陈志让、雅文远、张本懿等
3人。彼时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以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模式培养人才，给学生们授课的不但
有经济系的老师，还有包括陈序经、张纯明等
政治学、社会学名师，学科交融，兼容并包，
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眼界。

1945年秋，刘光第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获得货币银行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
《瑞典学派之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据研究
所研究主任方显廷先生回忆，受1936年英国经
济学家凯恩斯出版《货币通论》后兴起的“凯
恩斯革命”影响，1940年前后，研究生培养方
向重点从实际领域诸如土地制度与改革、乡村
合作、地方政府和财政转向经济理论与货币问
题。这篇论文是他后来成为货币金融大家的奠
基之作。论文指导老师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
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先生。毕业离开南开时
，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经济研究所何廉和方显
廷等诸位先生坚毅卓越的办学精神已内化于刘
光第先生的心中。

1939年至1945年的6年间，刘光第先生以
顽强的毅力和勤勉寻求到了学术救国、富民强
国之道。他曾说过，那6年，在很多博学多闻
、古风犹存的先生身上不但学到了科学知识



救国富民之术，也深为先生们发自内心的爱学
生、爱学术、爱国家的品格和精神所感染。尤
其是马寅初先生的铮铮风骨，对他影响很大。

亲历经济领域的“淮海战
役”，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良好开
端培养了最初一批宝贵人才

1945年9月，刘光第先生研究生毕业后，
经所长何廉先生介绍，到重庆中央设计局货币
银行组任研究员，并在沪江大学和重庆求精商
业专科学校兼任教员。1947年8月，他离开重
庆到上海，先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
统计室主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刘光第先生于7月调入
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担任研究员、计划科科
长，身处上海金融业接收改造的第一线，亲历
了由陈云同志领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大
米、棉纱、煤炭战争）。此役大捷，被毛泽东
同志评价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刘光第先
生用自己所学的系统经济金融知识，为迅速稳
定财政金融和恢复经济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满
腔热情地投入其中，为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建设
倾注了全部热情和力量，特别是为新中国金融
制度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这一时
期，他还任上海《经济周报》兼任总编辑，在
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兼
任副教授，在《解放日报》《大公报》《中国金
融》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学
术论文，并出版了专著《货币管理》。他的著
作和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为新中国金
融制度建立和货币金融管理提供了重要理论支
撑。

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
划”，金融事业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专业干
部，刘光第先生因其系统深厚的经济金融学理
论功底和成功的金融实践经验，于当年3月调
入北京，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担任政治经济学组
长。先后主讲“货币制度和货币管理”“政治
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等课程，为新中国
金融事业的起步、开拓培养了最初的一批宝贵
人才。195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与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
学校，196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
院，直至1996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刘
光第先生一直在这所学校潜心学术研究，精心
教书育人。即使在“文革”下放河南劳动期

间，他也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学术研究，不
忘初心，勤奋耕耘。在这一时期，他集中研究
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金融政策和实践
效果，梳理了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的成果，特别
是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经济金融状况，投入更
多精力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其著述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作
为高等院校教材使用，出版印刷30余万册，还
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这一时期的潜心研究和
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使他在“文革”结束后
成为推动经济改革最有影响的第一批理论先锋
之一，也是他后来给我们上课时深入浅出、纵
横捭阖、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浪潮中尽显峥嵘，
为富民强国奉献智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大幕，刘光第先生虽年过花甲，但他像朝
气蓬勃的年轻人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和勇往直前
的精神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之中，迎来了他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在改革开
放初期，我国理论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但许多问题争议很大，反
对改革的声音也不小。刘光第先生以坚实的经济
学理论基础，从客观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
总趋势出发，论证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农村联产承包到城市经济改革，从改革试
点到全面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计
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从“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论证中，刘光第先生都发表了他的创
新观点，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

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他
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学术研究之中，相继提
出了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人民币价值基础说
和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论等创新成果，在学术
界、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在货币信用的理论上，改革初期不少学者
把货币信用问题作为一个部门经济来看待，认
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要还是要靠实物指标
直接管理，刘光第先生特别论证了货币在经济
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专著《论中国宏观经
济价值管理》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货币化是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宏观经济管理应
由实物管理为主转向以价值管理为主”“宏观
经济价值管理首先是一种总量管理，其管理的
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平衡”的
观点。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就是要把货币和

货币资金的运动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着
力通过对货币和货币资金计划、分配和调控，
间接地实现对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调控。
刘光地先生的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为中央银行
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社会总需求提供了理论基
础，对建立系统的中央银行间接调控体系发挥
了重要作用。

再如，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必然会有一个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要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就必须正确认
识人民币的价值基础，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金
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的解释是模糊的。
1981年，刘光第先生与焦玉兰教授发表《论
纸币和黄金的联系》，明确指出“人民币价值
的基础不是商品，也不是商品价格的综合指数
，而是黄金”的核心观点。他们认为，纸币流
通不能按纸币流通规律的作用进行，而必须按
金币流通规律的作用行事；金币流通规律与纸
币流通规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纸币流通
条件下要自觉地使纸币流通符合金币流通规
律，以实现稳定币值，稳定物价的目标。他们
的论述进一步清晰了人们对马克思货币理论
的认识，丰富了货币理论，对经济宏观管理部
门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政策提供了理论
支撑。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20
世纪90年代我国金融市场起步阶段，出现了
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刘光第先生发表了一
系列论文，提出应按照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有顺序地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即优先发
展货币市场，再发展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中
，应优先发展债券市场，再发展股票市场；在
股票市场中，应着重发展与实质投资相关的
一级市场，再发展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发展
应以提高证券的流动性，为一级市场创造良
好环境为目的，而不应脱离一级市场单纯追
求交易量；无论是债券市场还是股票市场，
都应先发展现货市场，再有限制地开放期货
市场。刘光第先生的观点在我国金融市场发
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1993年，他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八五”重点课题《中国货币政策及其宏观
调控体系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
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搭建了宏观
调控体系的总体框架。

刘光第先生的经济思想是以货币金融为
主线的。他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核心作
用、货币稳定的内在基础、金融机构经营与
实体经济密切相关、资本市场发展的顺序与
资源配置、经济金融体制的运行和宏观调控
等方面的精深研究显示了强大的理论逻辑和
真理性力量，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中，刘光第先
生还积极活跃于各种学术论坛，他经常参加
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
银行等组织的金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金
融形势分析等方面的座谈会，是国家经济决
策部门和改革的智库机构经常邀请的经济
学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学会
恢复活动后，他担任常务理事，1993年
中国城市金融学会成立，他是首届的常
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对经济改
革和经济运行中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金
融政策提出的重要建议，许多都被采纳，
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贡献了全部智慧与
才华。

铮铮铁骨谦谦君子风，循循
善诱关心学生成长和学科发展

作为中央财经大学最知名的教授之
一，刘光第先生身上传承着中国优秀知
识分子特有的儒雅、简静和谦逊的气质，温

□ 张亚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关于
纸币问题的讨论不绝于书。尤其是在金属货
币制度尚未完全被信用货币制度取代的历史
时期内，纸币的本质是什么？与金属货币的
关系如何？始终是货币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议
题。

晚清至民国期间，受到世界货币体系变
动的影响，中国的货币制度先后经历了银铜
复本位、银本位和纸币本位，在清末民初
还一度出现了施行金本位的强烈呼声。国民
党政府发行的法和金圆券的相继崩溃，也再
次引发了人们对纸币与贵金属之间关系的质
疑。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是纸币本位制度，
但是围绕纸币与黄金的关系问题，仍然出现
了长时间的争论，时间大约从20世纪60
年代到80年代中期，郭大力、薛暮桥、
许涤新等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参与
到其中。刘光第先生的《论纸币和黄金的
联系》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是这一
问题争论接近尾声时期的代表性研究。

按照叶世昌先生的说法，这场争论的
双方可称为“黄金派”和“非黄金派”，刘
光第先生属于“黄金派”最主要的学者之
一。顾名思义，“黄金派”主张人民币的
价值基础是

货币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 ——再读刘光第先生《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

黄金。因此，《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旗
帜鲜明地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纸
币代表黄金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纸币
的发行和流通必须遵循金币流通规律。

刘光第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在当时的商
品经济条件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实
践和由实践所产生的理论能够否定纸币和
黄金的联系。纸币的流通应当符合三个要
求：第一，纸币必须且只能是具有价值实
体的代表，价值的实体最终归结到黄金。第
二，实际流通中需要的黄金和纸币数量，
是由商品流通对黄金的需要决定的。第三，
商品不仅决定货币，而且商品追求货币，
要形成一个买方市场，使卖方产生竞争。为
了加强论证的说服力，文章第二部分以“黄
金在国际上是真正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
殊商品”为

标题，举例说明了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体系
仍然重视黄金的作用，所谓“黄金非货币
化”政策是虚构的。文章第三部分主要反
驳了薛暮桥先生的“综合物价指数”说，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讨论，力图证
明物价指数并不是货币制度的发展的“最
高阶段和完成阶段”。文章最后从现实意
义出发，提出：爱惜金子，节约使用金子，
尽可能地多储备一些金子，对于加强人民
币币值的稳定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
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一文发表之后，
在理论界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李崇淮、易
梦虹、许国云等学者站在“非黄金派”的
立场上，与刘光第先生展开了商榷，核心
观点是“黄金作为货币商品是一个历史的
范畴”，现代社会的纸币和黄金已经没
有关系了。谭寿

清、王怀宁等学者则表达了对《论纸币
和黄金的联系》的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谭寿清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
期发表的《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
台》，该文指出争论的“关键问题是货
币要不要具有内在价值，我们承认不承认
货币必须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认识为我
们今天科学理解“纸币和黄金”的历史
争论无疑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货币思想长期领先
于世界。认为货币必须是（或代表）某种
有价值的金属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彭信
威先生称其为“货币金属论”。在此意义
上，《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似乎并没有
超出“货币金属论”的范畴。然而，看似
相同的主张背后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石。
中国传统的货币金属主义是基于朴素的
实践认知和路径依

润如玉又有风骨。

不久前，我曾委托我的同事杨国强博士
查阅了中央财经大学和重庆市档案馆保存
的刘光第先生的档案。他的大学同学丁
星钰先生1952年提供的一份材料中
写到：“刘光第为人颇富于正义感。当时
马寅初先生展开与四大家族的斗争所发表
的言论，他是非常拥护和赞扬的，马先生
被捕，他非常愤慨与同情，及释放回到重
庆歌乐山家中闲居后，他时常和一些同学
去看马先生。同时也很希望马先生重回到
重大商学院来领导青年、领导学习，只可
恨当时反动政权不准许这样做，以免扩大
影响，所以他当时很为马先生抱不平。他
对马先生那种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是极端
钦佩的。”他的故交、南开大学钱荣堃教
授在1957年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评
价：“刘光第在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研
究所学习期间比我低一级。根据我的了解，
他是一个好学不倦、不问政治、自命清高
、自以为超越政治超越党派的知识分子。
他不喜欢也不善于钻营，不善于逢迎，在
旧社会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的作风也比
较正派，有人说他是老夫子。”

这位他同学眼中的“老夫子”，在“文
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着强烈渴求
知识的我们，像许多重获自由的老师一样，
恨不得将身上所有知识一下子都传授给我
们。我1979年来北京读书时，他给我
们上“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课程，研究生阶段，他讲授“中
国经济改革专题”，他的课学理性和思想
性都很强，感受到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强
烈责任感。他的教学方法不是照本宣科，
而是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对教学中的一些
难点，总是鼓励和引导我们多发言，大胆
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课堂上气氛活泼，
效果很好，很受同学们欢迎。

那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舍还没有完
全收回，条件非常艰苦，友谊楼东侧那间
能容纳200人的第一教室排满了一场接
一场的学术讲座，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代
经济学家大多都在此做过讲座，有薛暮桥
、陈岱孙、于光远、吴大琨、刘国光、
张卓元、杨培新、刘鸿儒、吴敬琏、厉
以宁等，也有一批活跃的中青年学人。除
他自己演讲、主持或点评外，刘先生每次
都坐在第一排，笔记本上记录得密密麻
麻。那时，刘先生已是国内最有影响的经
济学家之一，但他仍保持着谦谦君子风。

刘光第先生非常关心学生成长，在同学
中有口皆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刘光第
先生给予了特别的教导和鼓励。1992
年我评教授时，他是我的推荐人之一，对
我的嘉许和奖掖至今激励着我不懈奋斗。
他的学术和为人，令我极为钦佩。

刘光第先生十分关心学科的发展。由于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时只有财政、金融
、会计这三个专业，刘先生在当时的政
治理论教研室。他多次呼吁扩展学科，特
别是理论经济学。他认为，没有理论经济
学的支撑，应用经济学很难达到一流水平。
由于当时校舍还没完全收回，条件实在不
允许，迟至1995年承担理论经济学科
建设任务的经济系才得以成立。可以告慰
刘先生的是，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经济系已发展成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院，
一大批潜力巨大的青年经济学家正在迅速
成长。

虽然刘先生的故交钱荣堃先生评价他“不
问政治”，但那是指在特殊的年代和环境
中。其实刘先生内心深处始终激荡着浓浓
的家国情怀。王强教授在《斯人风景旧曾
谙——中财大几位名师小记》中曾提到，
“在上世纪80年代，刘先生与我们一些
年轻人一样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90
年代初，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传达后，先
生同我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伟大，小平同
志就是英明。”一生探求民富国强之道，
爱学生、爱学术、爱国家——这是刘光
第先生留给我们的共同财富。



赖，《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的理论分析，
正如谭寿清指出的那样，则是建立在马
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刘光第先
生在文章中也明确写道：“马克思在批
判休谟的‘货币数量说’时……指出了
‘货币数量说’的要害是不承认劳动价
值学说……”因此，“黄金派”和“非
黄金派”的争论，本质上是劳动价值和
货币数量论的对立，是如何对待马克思
货币理论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学术环
境的变化，纸币与黄金关系的争论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淡化。然而
《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文中的有些观点，
在今天仍显示出其独有的生命力。刘光
第先生曾在文中指出，“当纸币不是那
么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代表黄金，而
是自我膨胀时，黄金便要后台走向前台，
甚至完全排除它的代表，亲自抛头露面”
。中国自古有“盛世古董，乱世黄金”
之训，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欧美各
国的黄金货币化潮流颇有加剧之势。30
多年后重读刘光第先生的这篇论文，仍
然让人掩卷深思。